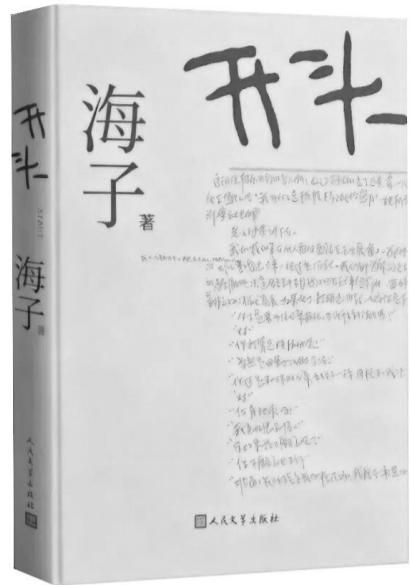


未完成的开头：海子小说遗稿续写春天

洪 树



2026年的春天，海子的名字再一次出现在书店的新书展台上。距离他辞世已过去了3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出版了根据其珍贵遗稿编成的小说集《开头》——一本迟到了30余年的书，一本书名由诗人亲手指定的书，一本几乎每一页都写着“未完成”的书。

《开头》迎面而来的是种时间感。这些写在上世纪80年代的篇什，像是被尘封在时间的琥珀中，又突然被放回读者手里。读到的不是一个被“完成”所封印的海子，而是一个永远停留在起跑姿势的

海子——笔尖刚刚触及纸面，故事刚刚张开翅膀，词语刚刚找到自己的气息。《开头》深刻的命题不在于它“讲了什么”，而在于它“没有讲完什么”；不在于它“完成了什么”，而在于它“悬而未决”的状态本身构成了怎样的美学。《开头》的书名并非编辑拟定的噱头，而是海子本人留在手稿中的遗愿。他在手稿中这样写道：“我为什么总是喜欢开头。我几乎所有的小说和诗歌都只开了个头，就放在那里……如果谁以后编辑我全部的小说稿子，一定要给我的小说全集起名为《开头》。”这几行字，将一本书的命名变成了一种写作行为的自我指认；不是偶然的搁笔，不是灵感的枯竭，而是一种有意为之——或者至少是清醒意识到的——创作状态的自觉命名。

这种“开头癖”在海子那里不是偶然现象。他在不足7年的创作生涯中写下近200万字的作品，其中大量的诗歌、诗剧、小说都处于未完成状态。但这并非才力不逮。恰恰相反，海子像一颗“争分夺秒地燃烧”的星宿，他拥有一般的创作能量。之所以屡屡停在开头，或许是因为开头本身对他而言具有某种本体论的意义——写作不是一个从起点走向终点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不断重新开始的精神运动。每一篇新作都是一次世界的重新创建，而创建世界这件事，本来就永远处在“开头”的位置上。

《开头》收录了《少年时代》《河流的

黄昏》《大草原》《庄园》《渔村》等十篇作品，均为首次面世。这些小说具有“虚构回忆录”的气质，决不等于非虚构，但契合了海子生命最后十年的生活状态，宛如一幅海子的精神自画像。

以卷首的《少年时代》为例。海子用第一人称、日记体的诗化语言，记录了一个少年从上世纪70年代初到1976年的成长记忆。叙述者写道：“有时突然地忘却了许多人和许多事。他们被埋葬了，也许是值得的……生活就是这样，今天埋葬了昨天，明天埋葬了今天，我毫不惋惜。”这段文字兼具诗人的超越与少年的通透，在平静的叙述中暗藏着对时间本质的深刻洞察。如果说《少年时代》是海子个人记忆的精神档案，那么《大草原》和《你就是找不到我》则展现了诗人幻想世界最瑰丽的一面。这两篇作品中出现了一个诗化的巫女形象，她如云似烟，在海边出生，海子为她取名“血儿”，形容她“就像闪电那样把自己照亮，转瞬即逝，又像烟一样变幻、弥漫”。这个形象让人想起中国古代文人书写里常见的“女神传统”，最典型的就是屈原笔下的湘夫人、山鬼。但在海子笔下，这种神性女子更像自由、灵性的代指，是一种诗人渴望抵达而不可得的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海子语言中那种令人惊叹的想象力。他管较大一些的花叫“大水”的足迹”，称草原上铺满的小的花为“泪”或“妹妹”，写道：“全部的妹妹，在雪山之下的草原上开放着。”这种命名方式，

不是修辞的雕琢，而是一种近乎神话思维的“创世”行为——用语言重新为世界命名，在词语中建造一个新的宇宙。大地、草原、太阳、星空、孤独、爱情、死亡等海子诗歌的重要意象在小说中延续并愈加充盈、具体化；情绪的自然流淌、内心的独白推动着叙事的前行，描绘出海子诗与小说相融共生的独特叙事景观。

纵览《开头》全书，一个核心主题反复浮现，那就是“未被驯服的生命力”。海子试图通过对原始生命元素的追寻，建构起一个属于东方的神话史诗。在文明的迷宫中，人如何保持生命的原初力量？在语言的重重遮蔽中，人如何说出那最初的、未经修饰的认知？海子的诗歌拒绝虚饰与妥协。他的小说也同样以兼具神性与痛感的诗化叙事，直面生命本身的痛苦与荒诞，彰显出一种决绝而清醒的精神姿态，展现出瑰丽而苍凉的悲剧之美。

《开头》具有文献价值。2024年，在海子家人和挚友的共同努力下，共计10种1592册页的海子手稿永久寄存于国家图书馆，其中包括海子的诗歌创作手稿，少量他人整理抄写的海子诗稿，以及海子本人书写的笔记、札记等。人民文学出版社从这些珍贵手稿中整理出的《开头》，以权威底本考据编校，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手稿原貌，包括不完整之处——个别字迹分辨不清的字词以方格代替，保持着文稿的原貌。这是对作者创作情形的尊重，也为研究海子的创作思维过程提供了一手资料。

落花与舟楫之间：诗圣晚景的另一种凝视

郑 坤

千百年来，杜甫的名字与“诗圣”的桂冠、“沉郁顿挫”的诗风、忧国忧民的情怀深度绑定。在世人固有的印象中，这位伟大诗人的晚年底色是悲苦与落魄的：一袭寒衣、半钵残粮，驾着一叶破旧小舟在长江与湘江的烟波中颠沛流离，最终客死异乡舟中，留下无尽的苍凉。然而，刘鲁颂的新著《杜甫的船：诗圣最后的漂泊岁月》以“船”为钥匙，试图打开一个截然不同的杜甫晚年世界。

全书以“船”为核心意象，构建了一个独具匠心的叙事框架。从“舟楫”启章，到“何处”“寄食”“寸心”“危樯”“南征”，直至“招魂”，最后以“余论”作结，7个章节如同7段航程，串联起杜甫自永泰元年（公元765）离开成都至大历五年（公元770年）病逝于湘江舟中的5年漂泊岁月。这5年多里，杜甫一家十余口人有一半的时间都生活在船上，船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流动的家园。作者并非孤立地描写杜甫的漂泊

生活，而是将盛唐至中唐的政治环境、经济状况、社会形势、典章制度、文化观念、时代风尚、人文地理以及人际关系等穿插其间。这种“以船载史”的写法，使杜甫的个体命运成为观察时代大转折的一个独特窗口。当读者跟随这艘船顺江东下、转入湘江，沿途不仅看见了一位诗人的心路历程，也看见了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宏大图景。

本书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对杜甫晚年生活状态的重新判定。1000多年来，人们普遍认为杜甫漂泊所乘的是一艘小船、破船，这艘船似乎成了杜甫“穷酸”的代名词，甚至成为其凄凉身世的象征。刘鲁颂却从诗文线索与现实逻辑两个维度对此提出了有力反驳。从常识出发，首先作者指出一家老少十余口人不可能长期生活在一艘破旧的小船上，何况这艘船还需在长江上日夜航行、经受暴风骤雨与激流险滩的考验。其次，作者通过对杜甫诗作的细致解读，还原了这艘船的真

实样貌。“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中的“危樯”，被作者重新阐释为高大挺拔的船桅，唯大船方能支撑如此高耸的结构；“地阔平沙岸，舟虚小洞房”中的“洞房”，则指向宽敞雅致的船舱，足以容纳十余人起居。更具说服力的一则细节是，杜甫在《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记序》序言中留下了船舱尺寸间的线索：他的桃竹杖长达两米有余，而他能够自如携杖入舱、无须弯腰，可见船舱高度不低于两米。

综合这些线索，作者保守估算杜甫的船长达20米以上、宽6米以上，是一般制作精良、陈设典雅、质量可靠的“豪船”。这一结论颠覆了千余年来“破船穷儒”的刻板印象，将“船”从凄凉凄凉的符号还原为一种具有现实质感的生活空间，进而让杜甫从一个脸谱化的悲苦老人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有生活追求的真实的“人”。

长期以来，杜诗研究的主流范式或是沿袭仇兆熊《杜诗详注》以来的注

疏传统，侧重训诂与史实考辨；或是从文学史角度讨论杜诗的风格演变与艺术成就。刘鲁颂的方法则更接近于一种“体验式”的研究——他以8年的系统阅读为基础，通过细致入微的移情式解读，试图从诗句中打捞那些掩藏在文字背后的生活细节和心理动因。这种阅读方式使他对杜甫晚年生活得出了判断：杜甫绝非简单的悲情角色，而是一位“极具责任感，富有极强的组织协调力，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极为执着和坚韧”的儒者，他“毕其一生，始终做到了个人性情、家庭责任和政治抱负的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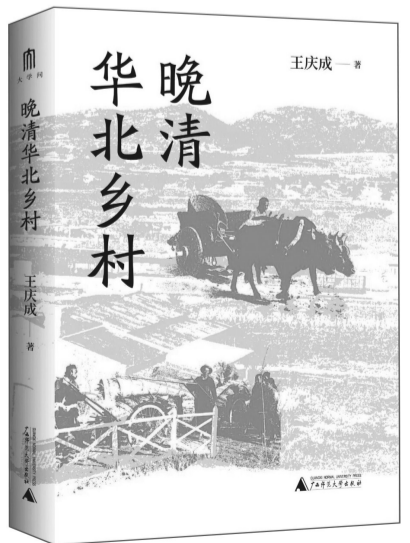
本书的另一亮点在于对生活细节的生动还原。比如书中写杜甫在成都浣花溪畔初萌购船之念，写他在梓州闻收复河南河北后欣喜若狂写下名篇的瞬间，写他与李龟年在潭州重逢时“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沧桑感慨——这些场景的呈现既植根于严谨的诗文考证，又洋溢着文学性的感染力。

重绘晚清时期华北乡村社会图景

汪 莲

提示

华北平原的乡村，是中华文明的腹地。晚清时期的华北乡村究竟是何模样？村落规模几何，集市如何运行，寺庙怎样分布，人口结构呈现何种特征？这些问题看似基础，却长期缺乏基于系统史料的实证研究。王庆成先生的《晚清华北乡村》正是填补这一空白的重要著作。



《晚清华北乡村》一书核心的史料价值，在于对“村图”的系统发掘与利用。所谓村图，是晚清光绪初年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修《畿辅通志》而要求各州县开展地方普查的产物，以村落为单位，详细记录聚落形态、人口、土地、学校、乡绅、寺庙、集市等信息，并附有各村略图。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一份清代基层的“村落调查报

告”。传世的村图极为稀少，现仅知存《青县村图》《深州村图》和《正定县村图》三部，王庆成充分利用了前两部。

村图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提供了一份珍贵的清代基层社会记录，更在于它所蕴含的信息维度之丰富。以《青县村图》为例，其记录了县城外434个村落的详细信息，包括户数、田亩数、集市日期、庙宇分布、乡绅姓名、学校状况等。这样一种多维度、体系化的基层档案，在清代地方文献中极为罕见。王庆成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整理与统计，形成了各类表格和图示，使晚清华北乡村的社会结构得以从模糊走向清晰。

村图史料此前并非完全无人知晓，但王庆成是第一位将其系统运用于晚清华北乡村研究的学者，且其研究深度与广度至今仍具有开创性。他以考据学的基本功对这些史料进行了缜密分析和交叉验证，同时广泛采集《保定府志》《定兴县志》《乐亭县志》等方志资料，以及西方人士在华旅行的记述，形成了多元互证的史料体系。这种史料功夫，是一个时代史学传统的遗存，也是今天大数据时代历史研究仍然不可替代的学术品质。

在村落形态方面，王庆成指出北方村落规模多为中小村落，百户以上的村并不占多数。这一判断纠正了一种常见的想象——华北平原上遍布着人口稠密的大型聚落。实际上，根据武清、梁城、青县、望都等州县的村落及人口资料，晚清华北的村屯只有少数是数百户甚至上千户的大村，绝大多数只是数十户乃至数户的小村。为安全需要，若干村落环筑土墙或设立“庄门”；为满足农事、生活和精神方面的需要，很多村落在内村外掘井、

立庙。这些细节的还原，使得我们对晚清华北村落的物理形态有了直观的认识。

如果说村图数据是本书的“血肉”，那么与西方学术理论的对话则是其“筋骨”。王庆成并非仅仅做了一个史料整理者的工作，而是将实证研究置于国际学术脉络之中，与既有的理论范式展开审慎的对话。其中最核心的对话对象，是美国学者施坚雅提出的乡村市场理论。

施坚雅提出，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他认为基层市场的平均范围是18个村庄、50多平方公里、7000多人口，这个空间区域才是农民实际的社会交往边界。王庆成在书中对这一理论提出了系统的质疑。他以青县、深州等地的实际数据证明，华北各州县的集市数量参差不齐，甚至差距很大；集市数与州县人口数、村庄数及土地面积的关系，并没有规则的比率；集市圈所包含的村庄多至近百村，少则二三村，甚至一村。面对如此悬殊的数据，施坚雅所设定的标准“18个村庄”这一数字关系便难以成立。

王庆成的质疑并非理论上的空论，而是基于翔实数据的实证批评。他承认施坚雅理论肯定市场体系对农民的重要意义，并且开创了研究农村市场的新局面，“自有其贡献和合理性”，但坚持认为“要证明基层市场的范围就是农民的社区是困难的”。这种既尊重前人研究又坚持实证检验的态度，体现了成熟史家的理论自觉。

将本书置于更广阔的学术史脉络中，其意义或许更为清晰。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研究形成了几个重要的学术传统：一是以费孝通《江村经济》为代表的社会人类学传统，强调以微观社区透视宏观社会结构；二是以施坚雅为代表的区域体系理论，将

市场层级作为理解中国社会空间组织的核心框架；三是以黄宗智、杜赞奇等为代表的“中国中心观”下的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致力于从中国内部的经验材料出发理解中国社会。王庆成的《晚清华北乡村》更接近第三种传统——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在与西方理论的对话中保持审慎和独立的态度，最终回到中国经验本身的复杂性和具体性。

这一学术取向在当下尤显珍贵。当前的历史研究正面临两种趋势的交织：一方面是“数字人文”兴起，大数据分析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另一方面是“碎片化”忧虑，微观史料的精细化研究有时被视为难以通向宏观认知。王庆成的研究恰恰提供了一条中间道路：他以村图、方志等细碎的基层史料为起点，通过对数据的系统整理和量化分析，最终回答了村落规模、人口结构、集市分布等具有整体意义的问题。在他的研究中，微观史料不是“碎片”，而是通往整体认知的基石；统计图表不是炫技，而是让模糊的历史事实变得精确可感的手段。

王庆成先生已于2018年驾鹤西归，本书的出版是对这位学者晚年学术耕耘的一次集中呈现。对于历史爱好者而言，阅读本书可以领略一位成熟史家如何从最细微的史料中提炼出具有整体意义的认识——这本身就是历史学最迷人的地方。

当我们目光投向晚清华北平原上那些只有数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当我们看到村图中标注的一口井、一座庙、一个集市日期，我们便在触摸一个时代最基层、最真实的生命纹理。王庆成以村图为镜，为我们映照出那个被战争、灾荒与变迁反复冲刷的世界——而这映照，本身就是史学最朴素的使命。

读到

阅读不是用来打卡的

李海卉

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一条新闻却刺痛神经：某网红读书博主宣称一年读704本书，打印出来的书单长达四五米，结果被人打假了——有些书连塑封都没拆。这场闹剧留下一个诘问：当阅读沦为打卡、被量化为数据、演变为个人秀时，它还是阅读吗？

近日，遇到两本书。一本是石磊的《读书记》，沉静的小书，温润内敛，讲的是一个人在书斋中与文字独处的时光；另一本是苗炜的《林中响箭》，是一本“重读”之作。两本书气质不同，却都指向了一个朴素的事实：书斋自有力量，阅读有其乐趣，这恰是被流量裹挟的当下需被重新感知的东西。

在社交媒体时代，书斋正在经历一场“公共化美颜”。有人晒出书房的照片，配上滤镜和美文，收获点赞与评论。石磊在《读书记》中呈现的是另一种书斋：它不是用来展示的，而是用来栖居的。书中记录的是那些琐碎的阅读时刻：淘到一本旧书的欣喜，与某段文字不期而遇的感动，以及灯下翻书时世界突然变得安静的那种恍惚。石磊没有大张旗鼓地告诉读者“我要读完多少本书”，只是坐在书桌前，一页一页地读下去，把那些心动的一瞬间记下来。

这种姿态本身就是对“打卡式阅读”的无声抵抗。书斋之所以有力量，不在于它藏书多少、装修多雅，而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可以让人慢下来的空间。在那里，没有流量逻辑的催促，没有今天必须读完的焦虑，只有书页翻动的沙沙声和思想缓慢发酵的过程。

苗炜的《林中响箭》揭示了阅读的另一重维度：重读。苗炜说，他之所以要写这本书，是因为年少时有很多读过的困惑一直没有解决，带着这些积攒了几十年的疑问，他重新翻开鲁迅、严复、王国维的著作，沿着他们的生平足迹踏访历史现场，与前辈学人对话，写出了厚重的读书笔记。

真正的阅读从来不是一次性消费。有些书值得一读再读；有些问题经历了岁月的沉淀才能豁然开朗。苗炜的重读实践恰恰表明：一本书是否真正“读过”，不取决于你是否把它从书架上拿下来，翻到最后，而取决于你是否在书中真正遭遇过自己，是否在文字的深处与作者有过一次真正的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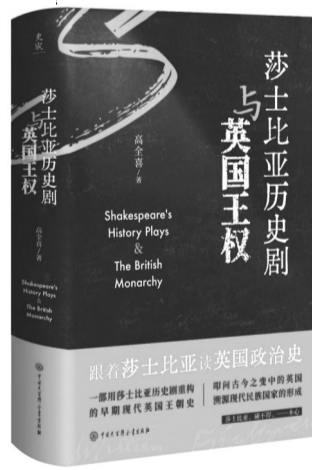
石磊笔下的阅读之乐，是一种不声张的欢愉。它不需要任何外部认证，就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而然地融入生活；苗炜则是追根究底的智性之乐，带着问题去读、去追问、去踏访，感受那种“原来如此”的豁然开朗，追求那种跨越时空与先贤对话的精神满足。

阅读是一种“发生”，而不是一种“完成”。当我们把阅读当作任务——今天要打卡、明天发朋友圈，它就变成了一种需要被完成的事项，乐趣也随之消散。而当我们把阅读当作一次相遇、一场对话、一段旅程，它便有了自己的生命。苗炜在《林中响箭》中用的词是“邀请”——他邀请读者一起“重新倾听鲁迅的呐喊，剖析鲁迅的自由，理解王国维的孤境”。这个邀请是一种真诚的分享。

放下手机，静下心来，进入一种不慌不忙的阅读，一种诚实的阅读，一种把身心还给阅读的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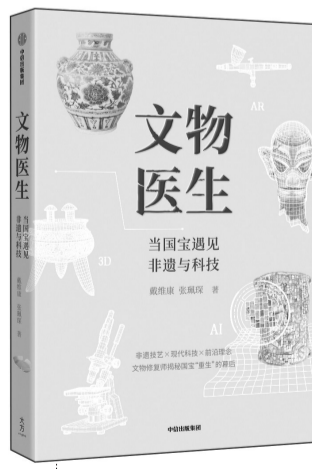
荐书

历史在回眸中清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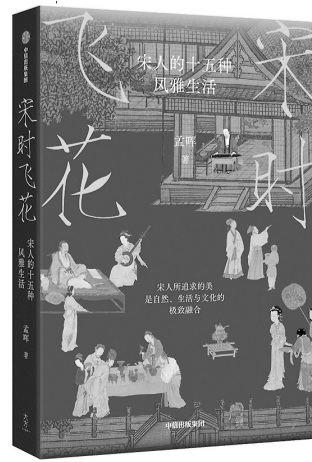
《莎士比亚历史剧与英国王权》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为什么胖老头儿福斯塔夫会成为英国文学史上最喜爱的经典形象之一？本书以莎士比亚历史剧为切口，融文学、法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于一体，审视英国王权从君权神授到王在法下的变迁过程，为理解英国政治史提供了独特的观察视角。



《文物医生：当国宝遇见非遗与科技》
中信出版集团

本书讲述了10个真实的文物修复故事。瑰丽的绿松石铜牌饰，神秘的三星堆青铜头像、深埋的御器工艺碎片，尽显平民淬炼的工匠精神智慧。上海博物馆国家级非遗技艺传承人匠心融合传统修复手法与当代数字科技，在修复工作中传递全新的修复理念。



《宋时飞花》
中信出版集团

在宋代，相约花下饮酒的文人雅集叫作“飞英会”，飞英会上飞花令，是宋人美学精神的一隅。从宫廷到闾巷，从饮食起居到节日民俗，宋朝对于生活有着极高的追求与热爱。本书以史料记载、传世宋画、考古实物和文学作品为依据，重现了清新雅致、闲适淡然的宋朝“慢生活”。